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和民族 (二) 戴庆厦, 何俊芳著 援—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缘年缘月
缘号 缘号 缘号 缘号 缘号 缘号

I 语... II 戴...②何... III 民族语—中国—
文集 IV 缘—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缘年) 第 缘号

语言和民族(二)

作 者 戴庆厦 何俊芳
责任编辑 宁 玉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缘号 邮编: 缘号
电话: (缘号缘号缘号发行部) 传真: (缘号缘号缘号发行部)
(缘号缘号缘号总编室) (缘号缘号缘号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缘号(缘号毫米) 缘号 印张: 缘号
字 数 缘号千字
印 数 缘号册
版 次 缘年缘月第 缘版 缘年缘月第 缘次印刷
书 号 缘号 缘号 缘号 缘号 缘号 缘号
定 价 缘号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多元一体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15)
试论新时期的民族语文工作	(16)
城市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	(17)
论母语	(18)
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	(19)
关于语言法基本理论的若干问题	(20)
民族心理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	(21)
论族际婚姻家庭与语言使用的关系	(22)
也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	(23)
梁河阿昌族的语言转用	(24)
载瓦文短时间内试行成功说明了什么	(25)
香港语文问题之我见	
—— 一国两制的语文使用问题	(26)
论双语学	(27)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问题	(28)
从民族关系看我国早期社会双语	
现象的形成及特点	(29)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的变化及对策	(30)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现状及任务	(31)
系统论与双语研究	(32)
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语文教学	(33)

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民族教育之路

——云南省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双语文教学体制启示录 ... (圆缘)

建立双语专业势在必行

——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开设蒙汉双语专业的启示 (圆猿)

中俄跨境民族双语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 (圆缘)

论俄罗斯人的双语问题 (圆缘)

前苏联的双语状况及其发展特点 (圆源)

濒危语言研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圆缘)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面临的几个理论问题 (猿缘)

濒危语言的年龄言语变异 (猿缘)

濒危语言与衰变语言

——毛南语语言活力的类型分析 (猿缘)

赫哲语的濒危状况及其成因 (猿缘)

赫哲族语言丢失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猿缘)

俄罗斯联邦诸共和国的新语言政策述评 (猿缘)

圆世纪 怨年代俄罗斯的语言改革 (猿缘)

前苏联的民族语言教学 (猿缘)

中亚五国的语言状况 (猿缘)

独联体国家朝鲜族的语言丢失问题 (源源)

论现代卡尔梅克族的语言情势 (源圆)

布里亚特语的形成、使用和发展问题 (源缘)

后记 (源圆)

多元一体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提要 文章认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密切相关。文章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从语言影响、语言使用两个方面阐述了多元一体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制约作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是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泰纳演讲”（~~费孝通讲稿~~）时首次提出的。他在演讲中说：“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然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 费先生的这些话指明了我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民族关系的实质，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各民族语言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 1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

一、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 少数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多元的格局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具有雏形。据考古学发现，在中华大地上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到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都有出土。如属于猿人阶段（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歙县人和大荔人等；属于古人阶段（旧石器时代中期）亦即 10 万年至几万年以前的，有广东省的马坝人，湖北省的长阳人，山西省的许家窑人、丁村人，贵州省的水城人、桐梓人和云南省的西畴人等；属于新人（或智人）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亦即二万年至一万年的有江苏省的泗洪人、山东省的新泰人、北京市的山顶洞人、山西省的峙峪人、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人、黑龙江省的哈尔滨人、吉林省的安图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江人、广东省的阳春人、台湾省的左旗人、四川省的资阳人、云南省的丽江人、贵州省的兴义人、浙江省的建德人等等。可见，早在人类进入文明的初期，中华大地上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到台湾都已有早期人类在活动，而且可以肯定，这些长期分居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以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则已明显地反映出不同民族集团的地理分布，即在仰韶文化及其反映出来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夏或华夏民族集团；在大汶口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东夷民族集团；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以及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南蛮民族集团；在新乐下层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北方其他新石器

时代的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北狄和东北地区的民族集团。^①就是说，我国多民族（多元）的分布格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大体确定了，各族群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各种考古文化与民族等同起来，但这些考古文化却反映着民族和民族关系的一些特征。如我国每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共同区域生活和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人们，他们所使用的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也一定具有共同性。因此，可以说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不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种范围内也反映了民族的特征，表现了不同民族即不同语言的存在，而且还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

随着历史的演进，不同区域性文化类型的人们共同体，经过不断的交融分合、兼并扩展，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华夏族。华夏族形成后，由于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成分而越来越强大并逐渐统称为汉族，并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了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中华大地内由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汉族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和出现了一些其他强大的族体。如秦汉时期的匈奴、氐羌、西域各族、百越、武陵蛮、西南蛮、乌桓、鲜卑、夫余等等；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黠戛斯、吐蕃、乌蛮、白蛮、契丹、奚等等。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明朝时期，一些新的族体如回、撒尼维吾尔（裕固）、土、撒拉、东乡、保安等共同体最终形成为民族，而且东南、华南、西南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诸民族在其族体及分布上

^①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也都已趋于稳定，为我国近现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总之，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而后经过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同时，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中华大地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现代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① 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着多民族（多元）的统一体，它的成员众多，而且成员之间大小悬殊。汉族经过 4000 年的壮大，已经有 12 亿 5 千万人（1995 年），占中华民族总人口的 91.5%，是当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其他 56 个民族人口总共 1.1 亿人，占 8.5%，所以把他们称作少数民族。

如前所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就拥有不同的文化，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应该是不同的。正如后来的史书如《礼记·王制》中所记载的那样：“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同，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再如，《战国策》记载：“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同。”《淮南子·齐俗训》：“氏羌僇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 3 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

长也，虽重象狄驩，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解馱篇》：“胡越之人，耳口相类，心意相似，对口交耳而谈，尚不能解。”《论衡·变虚篇》：“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因同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皇，不能去译。”《左传》“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摯币不通，言语不达。”以上这些记载反映了我国古代不同的族群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而我国现代 缘个少数民族使用的各种语言都是从其远祖使用的语言发展而来的，其五大语系以及各语系下面的语族、语支分布，都是对我国古代各民族语言的历史继承和发展。如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是在其商周时期的远祖肃慎人以及后来的挹娄人、勿吉人、靺鞨人、女真人所使用的语言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现代藏语，是由其远祖氐羌人以及后来的吐蕃人所使用的语言发展而来的；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语是在其先民濮人使用的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是由其先民 竭盘陀人使用的语言发展而来；属于南岛语系（又称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的高山族诸语言，则与我国古代南方百越民族的语言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总之，我国古代、近现代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中华民族从多元最终形成为一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始终受到我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制约。

二、多元一体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关系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和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始终制约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关系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在语言影响上，各民族语言不分大小，根

据实际需要相互影响，相互从其他语言中吸取所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以汉语作为丰富自己语言的主要来源；在语言使用上，各少数民族都以汉语为共同交际语，有些少数民族还转用了汉语。当然，我国多元一体的格局也决定了汉语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即汉语同样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汉族也有兼用乃至转用少数民族的语言的。

汉语影响

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有着悠久的历史，仅从能见到的文献记载看，早在汉朝时这种影响已有所反映。如西汉刘向《说苑》用汉字记载的《越人歌》歌词中已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后汉书》中记载的一段属于藏缅语族语言的一种古代语言的《白狼歌》歌词中就出现了一些汉语借词，如“圣、德、臣、仆、危、险、言、仁、传、万、匹”等。从 5 世纪的《突厥语词典》和 6 世纪的《五体清文鉴》等史书中也能看到当时的维吾尔语就已借用了为数不少的汉语借词，如“皇历、大唐、龙、将军、道人、公主、大帅、弟子、桌子、铺子、珍珠、甲、升”等。再如壮语由于深受汉语影响，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壮读汉字音系统”。总括地讲，我国的各少数民族语言都普遍受到了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语言影响上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各少数民族语言都以汉语作为丰富自己的主要源泉。过去一些曾以其他语种为吸收对象的语言，如西南边疆的景颇语主要从缅甸语和傣语借用词汇，西北的维吾尔语等主要从俄语里大量吸收词汇来丰富自己，解放后逐渐改变为以汉语为主要吸收对象。当然，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所受汉语的影响程度大小不一。受汉语影响大的语言，不仅借入了大量的汉语词语，而且在语音、语法上也受到了汉语的影响，有的因此改变了语言的类型（如海南三亚回族使用的回辉话由粘着型变为孤立型），有的甚至成为了混合语（如白语、五屯话等）。受汉语影响小的语言，

只涉及少量词的借用。另外，在我国古代，书写汉语的汉文，也对一些民族语言的书写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一些民族仿照汉字创造了本族文字，因此形成了一个汉字式文字系统。在我国封建社会，受汉字影响而产生的汉字式文字约有 60 多种，如：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大字、女真小字、西夏文、方块壮字、瑶字、侗字、水书、布依字、哈尼字、傣傣字、朝鲜谚文、喃字等。

在我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汉语也受到不同民族语言的影响。如汉语不断从各少数民族语言中吸收借词，以丰富自己。以吸收的突厥语借词为例，就有琥珀、冬不拉、坎儿井、肉孜节、伯克、汗、琵琶、唢呐等。突厥语还对甘肃汉语的底层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无格范畴，但在河州话中却存在着类似格范畴的现象，即名词在句中的作用是通过粘着后附语素的方法来表示。河州话中除有系统的类似格的模式外，还有许多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语言现象酷似维吾尔语中的模式，就像维吾尔语语法结构的投影一般。因此，河州话具有浓厚的粘着型语言色彩，显现出突厥语对其产生的影响。有些专家认为，汉语中的粤方言、闽方言之所以具有显著个性，其原因之一是古代受周围百越语、苗瑶语的影响。

圆语言使用

在我国，由于汉族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始终起着凝聚核心的作用，因此自秦以来汉语文就已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即各少数民族都把汉语作为自己的主要兼用语。即所谓“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辩之”^①。关于少数民族使用汉语文的记载，不绝于书，如与中原地区相隔甚远的西域诸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

^①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1 册，第 151 页。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人兼用汉语文。吐鲁番、尼雅、楼兰等地出土的大批汉文字书写的文书、简牍，涉及民间买卖田园、牲畜、粮食、丝织品的契约、官方屯田、收受供祀账、邮政、籍账等内容^①，可见汉语文在这里使用也相当广泛。如尼雅河出土的木简，有的就是在少数民族中来往的汉文书信。从出土的于阗文献来看，其中不少文书掺用汉文，使用汉文年号，甚至用汉文和于阗文共同书写。于阗文书中的许多名称，如长使、节度使、宰相、都督、大德、世尊等采用了汉文，其中还有一本《汉语—于阗语词汇》的对译词书^②。另外，考古中发现的被称为“和阗马钱”的地方货币，一面为汉文，一面为佉卢文，其使用年代约在 7 世纪左右^③。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生活在西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使用汉语文。另外，在我国古代，书写汉语的汉文，曾传播到一些少数民族中，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政府行文、记录时事借用汉文。如唐朝时期在云南洱海地区由乌蛮首领蒙氏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就以汉字为官方通用文字。其首领阁罗凤时期所立著名的《南诏德化碑》碑文，就是用汉字写成的。又如南诏王舜化贞授意绘制《南诏图传》，其款识、题记均为汉字。贞元十年（784），南诏王异牟寻与唐朝使者崔佐时会盟点苍山的誓文也是用汉文书写的。南诏统治者给朝廷或剑南节度使的书信也都是用汉文字写成的。此外，现存南诏时期的各种金石碑刻亦均为汉文。关于其他少数民族使用汉语文的事实，比比皆是，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关于汉族学习、兼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史书也有不少这

① 郑婕：“新疆双语史迹探略”，载《汉语双语双推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夏鼐：“和田马钱考”，载《文物》第 7 卷 8 页。1985年。

③ 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第 7 卷 7 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方面的记载。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就得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也会在学习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变化。如公元 499 年在吐鲁番盆地及邻近地区建立的麴氏高昌国原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建立的国家，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人是汉魏屯田士兵和晋代逃亡到这一地区的汉人的后裔，正是《魏书·高昌传》所说的“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化不纲，困难播越，世积已久。”当时这个高昌国的汉人胡化已深。如《北史·西域传·高昌传》所说：“服饰，丈夫以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虽习诵之，而皆为胡语。”高昌国存在了 150 年，最后这部分汉人的后裔融合于回鹘（维吾尔族）了。再如，北朝时学习鲜卑语成为汉族贵族子弟的时髦之举，高欢就能兼言汉语和鲜卑语。史称：“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高）昂若在列，则为华言。”^①（《高乾附昂传》）又如《颜氏家训》中提到：“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②（《教子篇》）另外，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有些建立了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汉联合政权，在这些政权中效力的汉族士大夫都普遍兼通统治民族的语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强迫汉族学习其语言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部分汉人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

历史上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兼用语言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在西域古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为西突厥所据后，当地居民都逐渐操起了突厥语和其他民族语言。这一现象在公元 630 年

① 《北齐书》卷 104 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②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 1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回鹘西迁，成批的回鹘人进入新疆后有了空前的发展。16世纪，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词典》中记载，喀什噶尔人操的已是纯正的样磨语了。同时他还说：“粟特人、坎切克人、阿尔户人属于讲两种语言者……和城里人打交道的和田人、吐蕃人和唐古特人有些也是这样……穷乡僻壤的珠摩人的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他们很会讲突厥语。”这些记载无疑都是对当地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兼用对方语言所作的翔实、生动的报道。至今在新疆、云南等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兼用对方语言现象非常普遍。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德昂族，许多人能兼用傣语。新疆的哈萨克、锡伯等民族中有不少人兼用维吾尔语。

总之，自古以来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各民族语言相互影响、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和使用对方语言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尽管朝代不断更替，汉族在某些时期处于被统治地位，但由于汉族在经济文化和人口上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所以汉语作为各少数民族兼用的第二语言和族际交际语的地位也始终未有变化，这种语言关系格局的形成成为我国现代多民族国家语言关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汉族和当代少数民族之间在语言使用上目前大体形成了这样的情势：大多数少数民族在以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同时，还普遍使用汉语。根据粗略统计，19世纪80年代末时使用“民族语—汉语”的双语人口约有1500万人，转用汉语的人口约有1500万人，二者相加为3000万人，约占当时少数民族总人口2500万（1880年）的1/3。如果再减去回族等使用汉语的人口，那么我国约有一半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当然，这个比例数在不同民族中是不同的，而且有时相差很大。同时，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约有1500万人，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兼用对方语言的约有1000万人。

三、小 结

“多元”与“一体”是辩证统一。我国语言关系中的“多元一体”格局，也体现了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汉语作为“族际共同语”，维系着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联系，无论是在语言影响上，还是在语言使用上，对中华各民族而言，体现了这个格局中“一体”的一面。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作为这个格局中“多元”的一面，曾经在历史上、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与“一体”并存。这是我国语言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是历史形成的。因此我们在分析我国的语言问题、观察语言现象时都要从这一观点出发。

我国语言关系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和“一体”之间是有机的结合，它们在不同的层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会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共存。历史上，这一格局中“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要松散一些，“一体化”的趋势也要弱一些，而现在和未来，随着全国和全世界在社会生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我国语言关系格局中“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一些，“一体化”趋势也会不断加强。这是大势，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语言的使用上顺应这一趋势。当然，我们在看到我国语言关系中“一体”的层面不可避免地在不断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一格局中“多元”的客观性和长期性，并应不断注意发挥“多元”在“一体”的大框架中的积极作用。

（戴庆厦、何俊芳，原载《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试论新时期的民族语文工作

提要 本文在分析新时期民族语文使用、发展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基本方针、主要任务做些理论探讨。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民族语文工作也得到了新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民族语文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民族语文工作遭到了惨重的破坏。1976年以后，“左”倾错误逐渐得到纠正，民族平等、语言文字平等政策逐步得到了落实，民族语文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新时期的民族语文工作，是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总结这一阶段的民族语文工作，对于做好今后的民族语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分析新时期民族语文使用、发展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基本方针、主要任务做些理论探讨。

一、进入新时期以来民族语文使用、发展的状况

从1976年到现在（1986）已过去10年，10年是经历一代人的变化。这期间，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人们的观念也有了很大变化。作为紧紧伴随

少数民族投入现代化进程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使用功能和语言结构特点必然会随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变化而变化。实事求是地认识近年来民族语文使用、发展的现状及其变化，有助于我们认识新时期民族语文演变的特点及其功用，并有助于预测民族语文今后发展的趋势。当前民族语文使用的现实是什么？

总的看来，除少数一些民族和部分杂居区外，大多数民族、多数地区，特别是民族聚居区，都还普遍使用本族语言。本族语言是他们主要的语言工具，不仅日常生活需要它，进行生产活动需要它，而且发展科学文化也需要它。

根据抽样调查资料估计，我国少数民族中 80% 以上的人仍使用本族语言的有藏、维吾尔、彝、壮、布依、白、哈尼、哈萨克、傣、傈僳、佤、拉祜、水、纳西、景颇、柯尔克孜、达斡尔、仫佬、布朗、撒拉、德昂、独龙、门巴、基诺 10 个民族。70% 以上的人仍使用本族语言的，除上述民族外还有蒙古、朝鲜、侗、东乡、阿昌、塔吉克、苗、黎、毛南、普米、塔吉克、鄂温克、裕固 11 个民族，共有 21 个民族。60% 以上的人使用本族语言的，除上述民族外，还有瑶、土、怒、保安、京、珞巴、羌 7 个民族，共有 28 个民族。50% 以上的人使用本族语言的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使用本族语言人口低于 50% 以下的，有满、土家、畲、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塔塔尔、鄂伦春、赫哲 9 个民族。列表如下：

使用本族语言占总人口的比例	民族数
80% 以上的	10
70% 以上的	21
60% 以上的	28
50% 以下的	9

上表显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数还使用本族语言。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使用语言的变化，比较明显的是兼用汉语的

人大大量增多，但单语人仍占相当比例。单语人占民族总人口 1/3 以上的，有藏、维吾尔、哈萨克、独龙、门巴等民族；占 1/2 以上的，除上述民族外还有蒙古、苗、彝、朝鲜、侗、哈尼、傣、傈僳、佤、拉祜、水、景颇、布朗、德昂等民族，共 15 个民族。少数民族中放弃使用本族语言而转用其他语言，超过本族人口 1/3 的，有满、土家、畲、仫佬、乌孜别克、塔塔尔、赫哲等民族。这说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即使是进入现代化的新时期，在发展上仍具有缓慢性的特点。

语言使用情况是党和政府制定语文方针、政策的依据。民族语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正确把握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变化状况，并依此制定对策。

半个世纪以来民族教育有了大发展。

进入新时期，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逐渐落实，民族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在校学生的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民族语文教学普遍展开。在有通用民族文字的地区，确立了本族语文授课为主并加授汉语文的双语教学体系；在无文字民族的地区，则以民族语言辅助学习汉语文，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汉语文教学体系。下面是民族自治地方教育事业增长数字：^①

类别	1952年	1982年
普通高等学校(所)	1	12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万人)	0.0001	0.0002
中等学校(所)	1	12
中等学校在校生(万人)	0.0001	0.0002
小学(所)	1	12
小学在校生(万人)	0.0001	0.0002

随着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学生在全国学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1982年 12月发布的公报“中国的少数民族改革及其实践”。